

试析利比亚战后的国家重建与政治发展

王金岩*

内容提要 2011年2月,利比亚爆发国内战争,后因西方多国对其实施军事干预而演化为颜色革命。其战后至今,国家重建未获成功,逐渐陷于政权分裂、经济困顿和社会动荡,长期成为其所在区域和邻近区域的安全毒瘤。其战后政权为维持统治纷纷争取外部力量的支持,而这些干预力量各为私利,不仅无助于利比亚实现和解与稳定,反而使之乱局不断加剧。2021年以来,在联合国的斡旋下,利比亚再次建立起统一行政机构,重新开启政治过渡进程。国家经历十年动荡后,民心趋稳,对立派别趋和,国家走向稳定和统一。然而,十年动荡使其国力大伤,外部干预仍然持续,其未来的发展之路仍然受到多方面的挑战。

关键词 利比亚 利比亚战争 国家重建 政治发展

利比亚自2011年爆发内战至2021年已过去10年。从其国内情况看,国家重建失败,政治权力分裂,经济发展受阻,安全局势恶化。从外部因素看,多种形式的外部干预始终存在,干预国各为私利。2020年以来,利比亚局势在跌入低谷后逐渐向好,但国内外仍存在多种障碍和挑战,为其恢复稳定和发展带来多方面的不确定性。

利比亚战后至今,学术界主要聚焦于对其战后各领域重建的关注、对战后乱局成因及影响的研究等。^①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利比亚战争的爆发及

* 王金岩,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代表作主要有田文林《利比亚战争的战略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2期;韩志斌《利比亚政治危机的历史追溯》,《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韩志斌、闫伟《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治重建及前景》,《国际论坛》2013年第1期;闫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蒲瑶《利比亚》(转下页注)

战后乱局的形成源于卡扎菲统治期间积累的弊病。一些阿拉伯国家学者在剖析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的同时，将利比亚战后乱局归咎于西方的干预。国内学者多注重从历史角度，以及部落政治的角度分析利比亚乱局的原因、发展趋势及影响。本文致力于探析利比亚战后十年乱局的成因及影响，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 利比亚战争后国家重建的失败（2011 ~ 2013 年）

2011 年 2 月，利比亚国内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运动，后演化为国内战争。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对利比亚实施军事干预，使其内战质变为颜色革命，最终实现政权更迭，前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战败身死。战后初期，颜色革命影响持续发酵，内外因素叠加导致利比亚战后国家重建的失败，国家陷入动荡乱局。

（一）西方大国力图对利比亚国家重建施加多方面影响

西方大国长期觊觎利比亚的能源和地缘。利比亚战争前，卡扎菲特立独行的作风和乖张善变的性格令西方不满和不安。利比亚内战爆发后，西方大国以行使“保护的责任”之名对其实施多方面干预，借机推翻卡扎菲政权。从战争中双方的力量对比看，反对派明显弱于政府军，是西方大国的“帮助”在其夺取国家政权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战后，反对派成为利比亚执政当局，主导国家重建，作为回报，在各方面都给予西方优厚待遇。西方大国趁机参与利比亚多方面重建，以实现自身意图。

（接上页注①）内乱的部落文化解读》，《世界民族》2013 年第 1 期；王金岩《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诸问题探究》，《西亚非洲》2014 年第 4 期；王金岩《利比亚战后乱局中的部落因素》，《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 年第 4 期；Wolfram Lacher, “Families, Tribes and Cities in the Libyan Revolut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8, Winter 2011; Haala Hweio, “Tribes in Libya: From Social Organization to Political Power,” *African Conflict and Peacebuilding Review*, Vol. 2, No. 1 (Spring 2012); Edward Randall, “After Qadhafi: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iby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9, No. 2, 2015; Nouredine Jebnoun, “Beyond the Mayhem: Debating Key Dilemmas in Libya’s Statebuilding,”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0, No. 5, 2015; Frederic Fehrey, “Libya: The Path Forward,”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arch 3, 2016;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Libya: Conflict, Transition, and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ne 26, 2020.

在利比亚政权重构中,西方大国致力于在利比亚推行西式民主制度,扶植亲西方政府。2011年3月,反对派建立“全国过渡委员会”作为战争期间的临时政府,11月,“过渡政府”正式成立,并完成前者向后者的权力移交。西方大国对临时政府和过渡政府都给予最早的承认,并向其提供技术顾问和物质支持,以在利比亚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并建立起亲西方政府。但利比亚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远未达到西式民主制度的要求,使之在利比亚遭遇水土不服,未能实现“软着陆”。

长期以来,利比亚政治体制落后,制度残缺。利比亚国家的形成不是民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在殖民列强划定的政治疆域内,被人为、强制地从外部设定并形成的。^① 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独立,成为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第一个非洲国家,也是由联合国大会支持成立的唯一国家。^② 因此,利比亚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是殖民统治的产物,国家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国家统一意识都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客观条件(独立后形成的民族国家框架和相对正常的国际环境)和主观努力(领袖的人格和才能以及国家的积极政策)的良性互动,才能解决上述矛盾。^③ 然而,利比亚独立后的几十年间,无论是主观努力还是客观条件,都没能达到上述要求。直至2011年战前,利比亚事实上仍然是一个披着国家外衣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其在战前的数十年里实施所谓的民众国体制,没有宪法和议会,禁止组建政党。其政治统治中充斥着个人崇拜和恩怨情仇的部落意识,严重滞后于政治现代化进程,更不具备实施西式民主制度的政治环境。

在经济重建中,西方大国通过参与多方面的建设项目获得巨额利润。利比亚拥有丰富和高质量的油气资源,战前石油产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95%,是典型的地租型国家。利比亚战争前,其主要油气田多与美国、法国、西班牙等西方大国合资开发。西方国家因在战争中的“贡献”而得到战后重建中多数重大经济项目的主导权和参与权。由于利比亚战后新政权快速建立,社会较快恢复稳定,且战争对油田和能源设施破坏并不严重,

① [加纳]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七卷),屠尔康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第636页。

② [美]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韩志斌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第94页。

③ [美]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韩志斌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第94页。

利比亚的能源产业一度恢复至接近战前水平。2012年9月,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公告称,油田生产、石油终端和炼油厂都已基本恢复,石油产能已恢复至141.7万桶/日,接近战前的160万桶/日。^①西方国家在参与利比亚能源的恢复重建过程中获得高额经济利益。

由于利比亚的政治土壤与西式民主政治体制不相容,后者被做成“夹生饭”,并引发整个机体的“消化不良”。利比亚没能建立起符合西方预期的稳定的政治架构和强势的亲西方政府,而是陷入政权碎裂,并引发多方面的混乱。

(二) 利比亚战后陷入乱局

2011年8月,随着卡扎菲政权垮台,利比亚国家重建大幕开启。利比亚国家重建既包括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物质领域的恢复和建设,也包括国家政权的重构和各项制度的创设。利比亚国内没有形成政治团结和建立起可行的政治体制,而是陷入政权分裂、经济倒退和社会动荡。

1. 政治重建陷入僵局

政权重构是利比亚国家重建进程中的关键步骤,是开启国家全面重建的前提和基础。2011年10月,利比亚战时“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此后的20个月为政治过渡期,并列出具体的时间表。但既定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多次被推迟或反复,政治过渡最终未能顺利完成。利比亚政治重建的实质为通过建立国家权力机构和制宪,使国家步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然而,无论是国家权力机构的构建,还是制宪进程都没能圆满完成。

由于利比亚政治发展基础薄弱,战后重建进程艰难。曾在战争期间团结一致、齐力“倒卡”的反对派分崩离析,都以国家的功臣自居,以实现本集团的利益为目的。2012年7月,利比亚举行战后首次全国大选,产生了具有政治伊斯兰倾向的国民议会,负责国家在战后过渡阶段的政治统治。国民议会的组成情况复杂,成员来自不同地区和部落。他们中既有王朝后裔,也有倒戈的卡扎菲政权高官,还有各地的民兵组织首领及部落长老,既包括世俗力量,也有伊斯兰组织,甚至还有趁乱混入的极端势力。他们

① “Country Analysis Brief: Libya,” November 9, 2015, https://www.eia.gov/international/content/analysis/countries_long/Libya/libya.pdf.

的政治目标各不相同,执政能力参差不齐,因而,他们主导下的国家重建必然目标分散,分歧丛生。利比亚战后至 2014 年初的两年多时间里,过渡政权历经包括战时“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贾布里勒在内的 5 位政府总理。^① 几届过渡政权都经历了组阁艰难,且更替频繁。制宪进程也是举步维艰。早在 2011 年 8 月,“全国过渡委员会”公布“宪法宣言”,规定在此后的一年内完成制宪,并据此举行总统选举。然而,制宪进程波折不断,直至当前尚未完成。利比亚战后的精英政府治国模式未获成功,国家政权渐趋碎裂,政治重建陷入僵局。

2. 经济重建陷入困局

利比亚战争使国家的基础设施遭到损毁,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破坏。其战后的经济重建是其他领域重建的物质基础。利比亚拥有优越的能源经济优势,其境内的能源储量多、质量高、易开采,且便于运输至有巨大能源需求的欧洲国家。其战前财政收入的 80% 以上来自石油出口收入^②,战后的几届政府依然将能源产业的恢复作为经济重建的第一步和最重要一步。然而,政权碎裂对其能源产业造成重大影响。

战后政局不稳定使得能源领域也出现制度短缺、人员更换频繁等情况,为统筹管理带来困难。利比亚的油田和输油管道分别位于不同派别和部落的辖区内,也有的跨区分布,因此,石油从开采到实现经济价值需要不同地区、派别和部落的配合与协作。然而,不同地区、派别、部落之间为争夺利益相互争斗和打压,甚至相互破坏和设阻。利比亚战后石油产量锐减,加上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共同导致利比亚能源收入严重下降。由于利比亚的经济长期依赖能源领域,其他方面的经济基础薄弱,结构脆弱。石油收入的减少和政局的不稳定使其他经济领域的重建都受到资金不足和管理混乱的制约。利比亚战后经济重建逐渐陷入困局。

3. 安全形势陷入危局

利比亚战后的政治转型和经济复苏屡屡受阻,安全局势随之恶化。在普通民众层面,多种形式的恶性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2012 年 3 月,南部塞卜哈镇的民兵武装与塔布部落武装爆发冲突,导致 50

① 王金岩:《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诸问题探究》,《西亚非洲》2014 年第 4 期。

② 潘蓓英编著《利比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 127 页。

人死亡, 100 余人受伤。^① 2013 年 7 月 27 日, 班加西市一座监狱发生暴乱, 1200 多名囚犯越狱。^② 在国家政权层面, 多种形式的争夺对抗交织出现。前政权残余势力复辟之心犹存, 以多种方式为临时政权的顺利执政设阻。反对派在战后共同执政中分歧丛生, 不同派别为争权夺利而相互混战。此外, 以“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为代表的极端组织趁机作乱, 加剧社会动荡。

(三) 西方多国因其乱局而撤离

利比亚在威权统治崩塌后, 各类武装派别为争权夺利而缠斗不休, 国家安全局势不断恶化。西方国家驻利机构、企业和个人成为当地武装分子袭击的重要目标。究其原因, 一方面, 当地民众将利比亚陷入战后乱局归咎于西方大国在战争中的军事干预; 另一方面, 民众认为这些国家参与利比亚重建的目的是攫取当地资源, 为自身谋取利益, 并致力于对利比亚实现更大的控制。面对利比亚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 西方大国选择撤离。他们先后关闭驻利使领馆和驻在机构, 并撤离在利侨民。

数十年来, 欧美企业是利比亚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主要合作者, 他们的撤离使利境内相关项目陷入停工状态, 致其经济困局雪上加霜。在利比亚战争期间, 西方大国以“保护的责任”为借口对利实施军事干预。然而, 当利比亚战后重建失败, 国家陷入乱局时, 西方大国却选择逃避, 将所谓“保护的责任”抛弃。西方大国在不同形势下做出不同选择凸显其趋利避害的本意。

利比亚战后前两年内, 不仅没有完成政权重构、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而是出现不同派别间分歧对抗公开化趋势。战争前后, 国家凝聚力不强的实质没有变, 不同的是战前国家呈现强人高压下平静、统一的表象, 而在战后, 没有一个人或一股势力能够服众且能担当领导国家的大任。战后的几届临时政府都热衷于政治纷争, 没有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置于国家重建的重要位置, 使国家经济不进反退, 社会动荡不安。这个阶段, 利比亚的外部干预以西方大国参与其战后重建为主要形式。

① “Scores Killed in Libya Tribal Clashes,” March 29, 2012, <http://www.aljazeera.com/news/africa/2012/03/201232901547564337.html>.

② 《班加西库非亚监狱发生逾 1200 人越狱事件》(阿拉伯文版), 2013 年 8 月 27 日, http://archive.arabic.cnn.com/2013/middle_east/7/28/libya.prison.break/index.html.

二 利比亚国家政权分裂 (2014 ~ 2018 年)

自 2014 年起,利比亚冲突呈现内部阵营化和外部国际化。东部地区是由退役将领哈里发·哈夫塔尔领导的“尊严行动”阵营,西部地区是由多个民兵组织结成的反哈夫塔尔的“利比亚黎明”阵营,^①两个阵营以多种方式对抗,且都受到不同国家的支持和援助。这一时期,整个中东地区也呈现阵营化,分别是:以土耳其和卡塔尔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阵营和以阿联酋、埃及为代表的世俗阵营。地区国家在利比亚的博弈进一步加剧了利比亚的阵营对垒。

(一) 国内两个阵营对峙

2014 年 2 月,国民议会以未完成任务为由,在政治伊斯兰力量的主导下自行将任期延长至年底,此举遭到国内的广泛反对。3 月,国民议会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宣布重新举行大选,并承诺向新选举出的国家权力机关——国民代表大会移交权力,但并未确定具体的选举日期。5 月 18 日,利比亚退役将领、世俗派代表人物哈里发·哈夫塔尔命令津坦(Zintan)民兵武装攻打国民议会。当晚,与哈夫塔尔关系密切的军方将领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但国民议会并未就此真正解散。6 月 25 日,利比亚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大选,产生了国民代表大会。但国民议会并未履行移交权力的承诺,而是将国民代表大会逐出首都,迫使其落户在东部小城德尔纳。自 8 月起,利比亚处于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并立对峙的局面。

为了弥合分裂局面,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②马丁·科布勒自 2014 年 9 月起在两个并立政府之间展开多轮斡旋,力图促成和解。双方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在摩洛哥斯希拉特市签署《利比亚政治协议》,同意结束分裂局面,组建民族团结政府。2016 年 1 月 9 日,民族团结政府正

① Sarah Yerkes and Nesrine Mbarek, “An Opening in North Africa,” October 26, 2020, <https://carnegie-mec.org/diwan/83024>.

② 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也是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的负责人。2011 年 9 月 16 日,应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建立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代表国际社会为利比亚的过渡和重建进程提供帮助和支持。

式组建。^①然而，由于对立两派间分歧严重，以上协议中的政治安排未能落实。民族团结政府虽然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但未能得到国内各派别的广泛支持，依然只能管控西部地区。国民代表大会与“国民军”结盟，共同控制东部及南部的部分地区。两个政府在东、西两地割据对峙的局面仍然持续。

两个政府分别与支持武装力量结盟，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多种形式对抗。他们是：国民议会、民族团结政府与支持它的武装力量，控制包括首都在内的西部大部分地区；国民代表大会与“国民军”共同控制利比亚东部、中部地区、南部主要城市及西部部分城市。双方对抗的主要形式为：通过暴力对抗争夺控制地域，通过阻挠对方的能源生产和运输遏制对方的经济能力。两派分别吸纳西亚非洲地区多国的武装分子，并得到外部多国的支持，从而使双方间的对峙形势更加复杂。

利比亚在这一阶段的情况是：在战场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主张发起和谈，占优势的一方则不同意，长此循环往复。即使双方在外部压力下同意和谈，并达成停火协议，和解愿景也会在短时间内被一方的冲突行为破坏，双方重回暴力对抗。

（二）地区多国在此博弈

2014年以来，美国在包括利比亚在内的中东地区实施战略收缩，不再谋求掌握外交领导权。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支持其欧洲和中东盟友在其中发挥作用。在此形势下，多个中东和欧洲国家支持利比亚对立派别的一方，在利展开博弈，俄罗斯也趁机介入利比亚事务。自此，利比亚国内冲突升级为代理人战争，致其乱局更加复杂难解。

1. 一些中东地区国家在利比亚博弈

2014年以来，中东地区国家趋于阵营化，^②分别支持利比亚冲突的一

① Michel Cousins, “Libyan Political Agreement a Failure, Say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alls for It to Be Renegotiated and Hafter to Be Included,” November 4, 2016, <https://www.libyaherald.com/2016/11/04/libyan-political-agreement-a-failure-says-international-crisis-group-calls-for-it-to-be-renegotiated-and-hafter-to-be-included/>.

② 邵玉琢：《中东格局的阵营化趋势》，载罗林主编《阿拉伯发展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第199页。

方。支持西部民族团结政府的主要有土耳其、卡塔尔、苏丹；支持东部“国民军”力量的国家主要有阿联酋、埃及、沙特。前者致力于扶植利比亚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后者则致力于阻止政治伊斯兰势力在利比亚扩张，维持世俗力量的领导地位。上述国家主要通过提供武器、物资、情报、培训服务和媒体支持等方式为冲突中的一方提供支持。他们也通过在利比亚境内扶植代理人使外部干预本地化。干预国之间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和对抗。其中，美国在中东的两个盟国——阿联酋和土耳其在这个时期内对利比亚事务介入较深，对其局势的影响也较大。阿联酋在包括利比亚在内的中东非洲多国实施军事冒险主义和经济扩张，以提升本国在区域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并遏制对方阵营的扩势。土耳其则有其在国内以及地中海海域战略中多方面的考量，随着其战略需要迫切性增大，在利比亚的干预力度也不断增大。

2. 欧洲大国在利比亚冲突中立场不一。

考虑到历史因素及多种现实因素，利比亚与欧洲多国都保持着长期的交往与合作。当利比亚政权分裂后，一些欧洲大国根据自身需要分别支持冲突一方。意大利曾是利比亚的殖民宗主国，在其独立后依然与其政府保持多方面的密切交往，在其政权分裂后支持国际社会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法国与利比亚的经济合作多在利东部地区，利南部的安全局势也对法国势力范围下的萨赫勒地区国家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法国支持“国民军”力量。俄罗斯从官方层面与利冲突各方都保持接触，同时通过非官方的方式对“国民军”给予武器和武装人员的支持。总之，欧洲国家在利比亚冲突问题上立场不一，无法形成合力助其实现统一。

(三) 西方大国有限回归助利反恐

利比亚战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进入利比亚大肆扩张势力，进一步恶化了利比亚境内及邻近地区的安全局势。“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于 2014 年 6 月宣告成立后迅速发展壮大，在正处于混战中的利比亚民兵武装中引发共鸣。自 2014 年末起，利比亚多地的民兵武装以及周边国家的武装分子、失业青年等纷纷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该组织在利比亚最盛时一度拥有约 7000 名恐怖分子，^① 他们在利接受训练后返回母国或被派至临近的非

^① 王金岩：《利比亚已成为“伊斯兰国”的“新中心”》，《当代世界》2016 年第 6 期。

洲和欧洲国家制造恐怖袭击。这不仅加剧了利比亚的安全危局，也严重恶化了非洲和环地中海域的安全局势。

2015~2016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境内发生暴恐事件的数量显著增加，且施暴者多为北非籍的穆斯林。^① 利比亚战争及战后乱局催生出大量难民，“伊斯兰国”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利比亚的难民问题。该组织利用利比亚战后乱局造成的边境管控松懈之机，向欧洲国家贩运来自非洲多国的难民以牟取暴利，致使欧洲在2015~2016年遭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

在民族团结政府的求助下，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回归利比亚助其反恐。他们派战机对利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进行数轮空袭，尤其在“伊斯兰国”力量最集中的苏尔特市实施精准打击，将2名该组织的头目定点清除。^② 在上述国家的帮助下，“伊斯兰国”在利比亚主体力量被消灭。但其部分成员化整为零地隐匿于利比亚南部沙漠区域，至今仍然时而在利比亚境内以及邻近国家制造恐怖事件。

2011年至今，利比亚冲突的显著特征是国际化。从国内因素看，对立两派的领导者为达到自身目的，主动寻求和试图操纵外部支持者。从外部干预的动力看，既有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也有控制其经济资源的目的，还有保障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从外部干预的主体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作用明显减小，地区强国的影响力上升。从全球背景看，多边体制混乱、规范弱化、美国对利比亚态度矛盾、欧洲不能形成合力、地区强国采取军事冒险主义、俄罗斯采取机会主义等，都推动了利比亚冲突的国际化。^③ 利比亚战争前，利比亚处于强人统治之下，拒绝外来干预。战争后的政权分裂给外部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地区强国在利比亚境内扶植代理人，使其国内矛盾升级为代理人战争，利比亚再次成为大国的博弈地。

① 王金岩：《欧洲安全问题中的北非因素》，《当代世界》2017年第10期。

② Issandr El Amrani, “How Much of Libya Does the Islamic State Control?” February 18, 2016,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north-africa/libya/how-much-libya-does-islamic-state-control>.

③ Sarah Yerkes and Nesrine Mbarek, “An Opening in North Africa,” October 26, 2020, <https://carnegie-mec.org/diwan/83024>.

三 利比亚从暴力冲突到和解统一 (2019 年至今)

自 2019 年 4 月起,利比亚国内两派为争夺首都控制权开始直接而激烈的军事对抗,外部力量加大干预力度。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20 年下半年以来,利比亚冲突双方出现和解趋向。当前,利比亚正在走向统一,但途中仍需披荆斩棘。

(一) 暴力冲突升级

2019 年 4 月,“国民军”对的黎波里发起军事行动,欲从民族团结政府手中夺取首都控制权,受到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武装力量的顽强抵抗。自此,利比亚境内的暴力冲突升级。分别以土耳其和埃及为代表的外部国家的干预力度随之加大,以及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多国突发都对冲突局势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本轮冲突伊始,由于“国民军”实力强劲,西部武装力量分散,前者的控制范围不断向西拓展。2019 年 12 月,哈夫塔尔宣布首都争夺战进入决战时刻。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多地暴发,法国、意大利、土耳其等主要干预国的疫情都较为严重。3~5 月,三国的每日新增确诊病例都在 1 万以上,甚至多达数万。^①各国政府忙于抗疫而减少对利比亚的干预,“国民军”趁机迅速向首都中心推进,其势力一度到达距首都中心不足 10 公里处。哈夫塔尔于 4 月底宣称接管整个国家。

然而,进入 5 月以后,战事发生逆转。土耳其加大对民族团结政府的全面支援,派出百余名土耳其籍军事顾问、指挥官、技术人员,以及数千名来自多国的武装人员。与此同时,曾在的黎波里为“国民军”作战的数百名俄罗斯雇佣军撤离,的黎波里以南的图阿雷格部落放弃对哈夫塔尔的支持,转而投奔民族团结政府。在此情况下,“国民军”节节败退。民族团结政府于 6 月 4 日宣布已控制整个的黎波里,正在派军向东继续追击撤离的

① 数据来源:利比亚国家疾病控制中心,2020 年 8 月 20 日, <https://ncdc.org.ly/Ar/libyan-covid-19-dashboard>。

“国民军”。^①此后，民族团结政府又夺回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泰尔胡奈市和瓦提耶空军基地，重新控制利比亚西北大部分地区。在此情况下，冲突双方高层纷纷出访，意在寻求更多的外部支持。在分别以土耳其和埃及为代表的力量的干预下，冲突双方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中部港口城市苏尔特附近形成对峙。

（二）埃土加剧博弈

2019年4月“国民军”开始进攻的黎波里后，土耳其就加大了对民族团结政府的支持力度。2020年1月，土耳其决定军事介入利比亚冲突，引发支持“国民军”的国家也加大支持力度。其中，埃及的表现最为突出，一度陈兵埃利边境，与土耳其剑拔弩张。

利比亚陷入政权分裂后，土耳其多次将大量武器弹药运入米苏拉塔，支援西部政府的武装力量。2019年4月首都争夺战爆发后，土耳其进一步加大了支持力度，在当年5~10月共向民族团结政府派遣了20架无人机和60名左右的土耳其军官对其进行支援。^②2019年11月27日，土耳其与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安全与军事合作谅解备忘录》。^③根据这份备忘录，如果民族团结政府提出请求，土耳其可以向利比亚派兵。12月26日，土耳其称收到了民族团结政府的申请。2020年1月2日，土耳其议会以325票赞成、18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授权政府向利比亚部署军队的议案。^④此后，土耳其多次向利比亚运送了大量弹药、武器、百余名军事人员和数千余名武装人员。其中，军事人员为土耳其籍，武装人员为叙利亚民兵和战斗人员。

此次土耳其对利比亚军事干预具有多重考量。从其国内看，埃尔多安政府在2019年的地方选举中支持率下降，试图通过出兵利比亚转移国内矛

① 藩晓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宣布收复首都的黎波里》，新华网，2020年6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6/04/c_1126075121.htm。

② Michael Young, “Into the Libya Vortex,” January 14, 2020, <https://carnegie-mec.org/2020/01/14/into-libya-vortex-pub-80776>。

③ “Erdogan: Turkey Will Send Troops to Libya Next Month,” December 26, 2019, <https://news.antiwar.com/2019/12/26/erdogan-turkey-will-send-troops-to-libya-next-month/>。

④ “Turkish Parliament Extends Troop Deployment to Libya,” December 2020,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0/12/turkey-troops-libya-deployment-extend-gna-lna-truce-erdogan.html>。

盾,提高支持率。从其与利比亚的关系看,其在利比亚长期保有较大的贸易和商业权力。如果哈夫塔尔夺取利比亚政权,这些权力恐将被沙特、埃及等国取代。从其所在的地中海域看,该海域在近年间勘探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而土耳其遭到域内其他国家的打压和孤立,欲通过与利比亚的合作扩大其在该地域的权力。从世界范围看,近年间土耳其因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和意识形态因素受到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孤立,希望以此打破外交僵局。

土耳其的军事介入使曾经处于优势的“国民军”节节败退,引发支持“国民军”国家的不满。其中,埃及的反应最为强烈。2020 年 6 月 6 日,在哈夫塔尔访问埃及期间,塞西总统提出一项名为“开罗宣言”的政治倡议,^①意在促成双方停火,同时将一辆坦克和数架武装直升机部署在埃利边境附近。该政治倡议遭到民族团结政府和土耳其的拒绝。6 月 20 日,塞西强势宣示,不允许任何方面对埃及西部边界的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否则埃及有干涉利比亚的合法权利,并指示军队为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②

埃及此次宣示出于经济和安全两方面考虑。经济方面,利比亚两派当时正在争夺的苏尔特位于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之间的要冲,扼守利比亚东部石油产区的西大门,也是通往利比亚四大重要港口的必经之路。埃及要维护在利比亚既有的经济利益,必须确保“国民军”守住苏尔特。安全方面,随着民族团结政府力量向东挺进,越来越靠近埃及的西部边界,直接威胁埃及边界安全。

最终,埃及与土耳其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对决,双方都因各自国内局势的掣肘而保持克制。埃及国内经济持续低迷,政治和安全局势时而受到挑战,且因水资源问题与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等邻国间龃龉不断。军事介入利比亚是埃及最后的选择。土耳其也正面临多重内外困境,使其在与埃及的对决上保持了最大的克制。

① 该倡议的主要内容为:有关各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利比亚总统委员会成员,这些成员来自利比亚三大地区,委员会在一年半的过渡期内治理国家,之后举行各层级选举;利比亚各类金融、石油部门实现统一管理;解除民兵武装,所有外籍武装人员撤出利比亚。

② “Egypt’s Sisi Says Turkey/Qatar-Backed Assault on Libya’s Sirte Is ‘Red Line’,” June 21, 2020, <https://www.thedefensepost.com/2020/06/21/egypt-sisi-libya-turkey-sirte/>.

(三) 国家走向统一

本轮冲突爆发后，联合国、多个西方大国，以及利比亚的地区邻国都以各自的方式对利比亚展开斡旋。其中，德国政府主办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对此后双方走向和解具有重要作用。2020年1月19日，德国政府在柏林主办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邀请冲突双方、多个世界大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首脑或高级别代表参会。^①虽然冲突双方的领导人因“分歧太大”未能在会议期间直接会面，但与会各方经过艰难磋商后达成一份成果文件，主要包括：同意遵守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终止对冲突各方的军事支持，共同促使冲突各方将停火转化为长久和平，等等。^②会议还提出，未来利比亚冲突双方的和谈将在政治、经济、军事三条轨道上并行。2月，联合国安理会以决议方式对柏林会议成果予以肯定。此后至今，联合国主导的利比亚问题和谈进程都在据此进行，双方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逐渐达成共识。

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对利比亚局势产生了一定影响。2020年3月24日，利比亚检测出首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此后，由于利比亚诊疗能力不足，与多个疫情严重的欧洲国家长期保持密切交往，以及两派持续交战等因素，疫情持续恶化。两个政府分别在各自控制区域内采取了宵禁、封锁、停止聚集活动等应对举措，但收效甚微，每日确诊病例数仍不断攀升。尤其是自2020年7月起，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进一步上升，从此前的不足500人升至1000人左右。^③鉴于其检测能力有限，实际病患情况恐更加严重。

在联合国的积极斡旋以及严重的疫情之下，利比亚对立两派的主要政治力量首次“齐声”喊停火。8月21日，民族团结政府总理法耶兹·萨拉杰宣布在利比亚境内实行全面停火，并呼吁在2021年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东部国民代表大会主席阿吉莱·萨利赫也于当天发表声明，支持停火和举行选举。此后，两派又在联合国的斡旋下于2020年9月和10月先后在摩洛

① 王金岩：《利比亚问题：斡旋者德国》，《环球》2020年第6期。

② 王金岩：《利比亚问题：斡旋者德国》，《环球》2020年第6期。

③ 数据来源：利比亚国家疾病控制中心，2021年3月30日，<https://ncdc.org.ly/Ar/libyan-covid-19-dashboard>。

哥、瑞士等国举行多轮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多方面的对话和谈判。双方就利比亚未来的和解机制、重要职位的地区分配数额等问题达成一致,并共同商讨统一制宪、东西通航以及恢复石油生产等相关问题。

自 2020 年 10 月起,利比亚的统一和解进程不断取得新突破。经过几轮和谈后,冲突双方于 10 月 23 日签署在利比亚全境实行“完全和永久”停火协议^①,并一致同意将组建一个联合机构监督停火协议的实施。自此至今,利比亚境内一直保持停火状态。这是利比亚自 2014 年政权分裂以来首次实现真正且持久的停火。11 月 3 日,双方首次实现在利比亚境内的直接和谈。11 月 13 日,双方在对话会议上达成一致:将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2021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5 日,在联合国斡旋下,75 名利比亚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部族首领以及东、西、南三地政要再次在瑞士举行对话,选举产生出总统委员会 3 名成员及过渡政府总理人选。2021 年 2 月 25 日,过渡政府总理向国民代表大会提交了新内阁成员名单,于 3 月 10 日获得批准。新内阁已于 3 月 15 日在班加西宣誓就职,并于次日与卸任的民族团结政府举行了交接仪式。^②该内阁将在 2021 年底大选前领导国家的过渡政治阶段。

四 利比亚未来局势展望

多年战乱造成利比亚发展停滞,民众生活困窘,也为其所在地区及相关国家的安全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国内趋和态势明显,外部促和力量增强,冲突两派间已开启统一和解进程。但由于利比亚乱局持续时间久,涉及方面多,内外多重因素错综复杂,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仍然面临多重挑战。

(一) 国家统一大势所趋

自从其政权分裂后,国家的决策者不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些具有不

① “UN Salutes New Libya Ceasefire Agreement that Points to ‘a Better, Safer, and More Peaceful Future’,” October 10, 2020,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10/1076012>.

② 藩晓菁:《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批准新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新华网,2021 年 3 月 1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3/11/c_1127196308.htm.

同想法的人。他们为实现个人目的不惜向外国寻求帮助，其结果就是为利比亚引来外部干预，致其主权受到侵蚀。利比亚已经历了战后十年的分裂与动荡，国家元气大伤，国力严重衰退。当前，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都认识到：只有国家统一才能使国家走上发展之路。利比亚已开启政治和解进程，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

1. 国内求和意愿上升

一方面，民心求稳。利比亚战后的政权分裂带来经济不进反退和社会持续动荡。多年战乱造成国家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水、电、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不足。一半以上医疗机构遭到破坏，诊疗物资严重短缺，使利境内的疫情难以控制。截至2021年4月，利比亚共确诊新冠肺炎病例逾17万例，死亡近3000例。^①民众盼望国家尽快结束分裂状态，恢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些民众甚至表示，虽然不喜欢卡扎菲的统治，但是怀念卡扎菲时代平静、富足的生活。^②

另一方面，对立派别趋和。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冲突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开展和谈，取得积极进展。政治方面，根据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达成的路线图，利过渡政府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该政府是技术专家型政府，当前主要致力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电力短缺等其国内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组建全国和解委员会以促实现国家统一。

经济方面，致力于实现全国的统一发展。2020年12月16日，利比亚央行董事会决定，境内统一调整汇率，从当时的1.4利比亚第纳尔兑换1美元，调整为4.48利比亚第纳尔兑换1美元。^③上述决议是应对当前国内经济危机的重要一步。利央行表示，未来还将采取统一预算、统一公共部门工资、统一管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措施，以推进国家经济的统一发展。

军事方面，冲突双方自2020年10月底达成停火协议至今，没有爆发暴力对抗。自2021年2月11日起，双方的军事工程人员开始启动沿海公路清

① 数据来源：利比亚国家疾病控制中心，2021年3月30日，<https://ncdc.org.ly/Ar/libyan-covid-19-dashboard>。

② 《中东面面观 | 新主席 + 新政府 利比亚的春天还有多远》，央视新闻客户端，2021年3月18日。

③ “Statement of Central Bank of Libya Regarding Exchange Rate Modification,” December 17, 2020, <https://cbl.gov.ly/en/2020/12/17/statement-of-central-bank-of-libya-regarding-exchange-rate-modification>.

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物的行动。此项工作完成后,国家将在军事重地统一重新部署部队。

此外,利比亚东、西部之间的交通也在逐步恢复。2020 年 10 月 17 日,从黎波里到班加西的航班首次恢复,该航班一度被视为从西部飞往东部的“和平鸽”。^①2021 年 3 月 9 日,利比亚国家航空公司一架航班从班加西起飞,随后降落在米苏拉塔机场。这是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与西部城市米苏拉塔之间的航班在中断近 7 年之后的首次通航。目前,该航空公司计划在两个城市之间每周飞行四个班次。有关重新开放连接东、西部主要公路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中。^②

2. 外部促和力量加大。

首先,联合国对利比亚问题加大投入。2020 年以来,联合国对利比亚冲突双方展开了更加密集的斡旋。安理会通过第 2510 号决议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负责人在联合国总部、第三国或利比亚境内多次主导冲突双方的会谈,使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和解进程有效推进。在前任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负责人加桑·萨拉姆于 2020 年 3 月离任后,由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大国间意见分歧,新任负责人一度未确定。为了不影响利比亚的政治进程,联合国任命了临时代理负责人斯蒂芬妮·威廉姆斯,直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安理会批准时任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具有丰富斡旋经验的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出任新一任负责人。^③斯蒂芬妮在履职期间积极在冲突双方间斡旋促和,使利比亚政治进程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取得显著进展。

其次,美国对利比亚问题的政策趋向有助于对立派别的和解。拜登于

① “Symbolic Libyan Airlines First Flight from Tripoli’s Mitiga Arrives at Benghazi’s Benina Airport,” February 10, 2021, <https://www.libyaherald.com/2021/02/10/symbolic-libyan-airlines-first-flight-from-tripolis-mitiga-arrives-at-benghazis-benina-airport/>.

② “Flights Resume between Libya’s Rival Cities of Benghazi, Misrata after Seven Years,” March 9, 2021,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north-africa/2021/03/09/Libya-conflict-Flights-resume-between-Libya-s-rival-cities-of-Benghazi-Misrata-after-seven-years>.

③ “UN Appoints Jan Kubis as Special Envoy on Libya,” January 19, 2021, <https://libya-business-news.Com/2021/01/19/un-appoints-jan-kubis-as-special-envoy-on-libya/#:~:text=United%20Nations%20Secretary-General%20Ant%C3%B3nio%20Guterres%20announced%20today%20the,established%20pursuant%20to%20Security%20Council%20resolution%202542%20of%20282020%29>.

2021年1月就任美国新一任总统，从他面临的国内形势看，美国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重，未来，他还将为此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因此，对于外部国家，他将减少直接的干预，以低成本的间接介入为主。从外部因素看，十年前爆发“阿拉伯之春”时，他作为美国副总统亲历了整个过程，并目睹了此后十年间一些变局国家的动荡乱局带给美国及其盟国的负面影响。为避免继续受到更多的干扰，他将成为利比亚局势的促和因素。从他的执政理念看，他注重推行美式民主价值观，抵制威权主义。利比亚正处于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是其扶植和拉拢的对象。因此，美国将支持利比亚的和解及民主制度的建立。

再次，地区邻国支持利比亚自主发展，抵制外部干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利比亚的邻国多次通过双方会晤和主办利比亚问题多边会议的方式促成双方和谈，并主张探索从其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2020年1月23日，阿尔及利亚在首都阿尔及尔主办关于利比亚问题的国际会议，邀请7个周边国家的外长或代表与会。他们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允许利比亚人民自己解决目前的危机，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外来干预。^①2月2日，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与到访的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讨论利比亚局势时再次呼吁：唯有在利比亚人的主导下，以利比亚人选择的方式才能解决利比亚问题。^②

最后，从主要干预国看，促和因素上升，拉偏架力量下降。法国、意大利、埃及等国介入利比亚的目标是维护他们在利比亚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利比亚实现稳定和统一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符合他们的利益。哈夫塔尔在首都争夺战失败后，埃及和俄罗斯不再对“国民军”给予单方面的军事支持。一方面，他们开始与冲突各方都保持接触，从单方面的支持者转而成为多方间的斡旋者。俄罗斯多次就利比亚问题与土耳其沟通，希望促成冲突双方的和解。利局势出现好转趋势后，俄也就重开驻利比亚使馆事宜与利比亚西部政府沟通。2020年11月，利比亚西部政府的内政部长访问埃及。12月底，埃及政府高级别代表团到访的黎波里，会见利比亚民族团

① 黄灵：《利比亚周边国家外长会议呼吁利比亚冲突各方停火》，新华网，2020年1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1/24/c_1125498586.htm。

② “Algeria, Tunisia Discuss Libyan Crisis, Bilateral Cooperation,” February 3, 2020,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2/03/c_138750467.htm。

结政府内政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这是 2014 年以来埃及首次派出高级官员访问利比亚。双方谈及加强安全合作、埃及重开驻利比亚使馆, 以及的黎波里与开罗重开航班等事宜。^① 阿联酋对“国民军”的资助力度也明显减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支持“国民军”的国家转向拥护国民代表大会议长阿吉拉·萨利赫的政治路线图, 支持利比亚通过政治方式促成和解, 致力于塑造后哈夫塔尔时代的利比亚。

(二) 多重挑战仍然存在

当前, 利比亚再次开启统一和解进程, 仍然面临内外多方面的现实困境。从国家内部看, 持续数年的乱局复杂难解, 考验新政权的治理能力。从外部因素看, 联合国决议的落实情况、干预国的做法等都对政治过渡进程产生影响。

1. 内部治理困境难解

从新政权的情况看, 一方面, 其主导力量呈现多层级和碎片化。从整体看, 东、西两个政权并立对峙已持续数年, 二者在国家发展道路、治理方式等多方面都莫衷一是。每个政权又都是由多股次级力量组成或支持, 如西部政权受到米苏拉塔民兵、津坦民兵等多个民兵组织的支持; 东部政权则包含萨阿迪、阿瓦及尔等多个大部落力量。这些民兵组织和部落之间也在为各种权力和利益而相互竞争和博弈。新成立的过渡政府成员数量多, 机构庞大, 就是因为派系间争夺激烈, 难以达成平衡, 因而不得不将大量派系代表都吸纳进来, 以此暂时平息派系之争。未来, 新的过渡政府治国期间, 无论原来的东、西两个政权间, 还是各自内部的次级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然存续, 成为国家统一治理的障碍。

另一方面, 新政权组成复杂, 且缺乏执政经验。利比亚战后至今, 各政治力量都致力于扩大自身权力和打压竞争者, 而没有专注于思考国家的发展问题, 不曾有一支政治力量提出过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施政纲领。新的过渡政府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区, 代表不同的政治力量, 没有过治理统一国家的经历, 普遍缺乏执政经验。他们共同制定出统一、可行的政治目标并

① “Egyptian Delegation’s Visit to Tripoli Overdue, Yet Important; GNA FM,” April 18, 2021,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397832/Egypt/Politics-/Egyptian-deleg-ations-vis-it-to-Tripoli-overdue,-yet.aspx>.

非易事，对境内武装力量的统一整编和掌控更是难题。

从国家的情况看，多年乱局使国家元气大伤，社会动荡余波未平，而且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重。利比亚自 2014 年至今历经七年的政治分裂、经济倒退和社会动荡，国家重建的起点极低。政治方面，虽然已在联合国的力推下走上民主政治道路，但民主制度能否与其现实的政治土壤相融合仍有待观察。经济方面，2020 年，其各项经济指数都是战后十年内的最低水平：GDP 增长率为 -66.7%，原油产量为 30 万桶/天，石油领域 GDP 增长率为 -72.7%，非石油领域 GDP 增长率为 -22.6%，通货膨胀率为 22.3%，财政收支平衡为 -102.9%^①。安全方面，利境内的武装派别之间曾长期暴力相向，从而形成暴力思维。虽然已建立起统一的政权，但政权内部不同派别间的矛盾并未完全消弭。武装组织之间出现分歧时，仍存在“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截至 2021 年 4 月，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在 1000 例左右。国内多方面乱局对新政权执政构成严峻挑战。

2. 外部干预因素仍存

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停止外部干预利比亚的相关规定未得到切实执行。安理会在 2020 年多次发表声明表示，根据各方先前达成的协议，所有外国武装人员及雇佣兵都应撤出利比亚。然而，分别以土耳其、俄罗斯为代表的冲突双方的支持国都没有切实遵守。2020 年 12 月 22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议案，批准将派驻利比亚的土耳其军队驻扎期限延长 18 个月。土耳其将根据与民族团结政府签署的《安全与军事合作谅解备忘录》，继续向利提供军事训练和顾问支持。^② 俄罗斯军事机构派遣至东部的瓦格纳武装人员也尚未撤出。此外，安理会关于外部国家对利比亚武器禁运等多项促成真正停火的决议也不能保障实施。土耳其、俄罗斯等国欲在利比亚常设军事基地的意图也十分明显。

另一方面，干预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分歧仍存。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在上一任卸任近一年后才得以重新被任命，主要由于一些西方大国对该人选及其职权等意见不一。美国曾试图切分联合国秘书长利比

① “Libya: A Decade of Woes at Dusk,” March 23, 2021, <https://www.arabiamonitor.com/publication/libya-2021>.

② “Turkey to Extend Military Deployments in Libya,” December 13, 2020, <https://www.libyanexpress.com/turkey-to-extend-military-deployments-in-libya/>.

亚问题特别代表的职责，由一人主管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另一人主管利比亚停火斡旋，这一想法遭到多个国家反对。原来的一人代表形式保留，但就代表人选问题继续博弈，直至 2020 年 12 月才产生出来。此外，当前，包括土耳其、俄罗斯，以及欧盟多国等利比亚的主要干预国都对利局势持谨慎观望态度，一旦其政治过渡失败，他们仍可能重回选边站队的状态。

由于利比亚冲突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局势走向将是冲突双方妥协和外部干预博弈的共同结果。从当前情况看，外部干预既是利比亚问题的制约因素，也在其实现和解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长期看，只有当利比亚的发展道路由本国人民选定，利比亚才可能实现真正和持久的和解。^①

结 语

2011 年至今，利比亚冲突呈现阵营化、军事化、国际化和持久化的特点，其中有国内原因，也受区域因素和全球大环境的影响。2021 年 3 月，新过渡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利比亚政治取得了自 2014 年以来最大的进步。虽然当前仍然面临内外多方面的挑战，甚至在 2021 年底的选举前仍存在局部动荡的可能性，但国家走向统一与稳定的大势已定。随着其国内经济实现统筹规划，石油产出能力将逐步恢复，国际油价回升将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利比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将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

[责任编辑：张玉友]

① “Election of the New Transitional Leadership in Liby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ebruary 15, 2020, <https://epc.ae/brief/election-of-the-new-transitional-leadership-in-libya-challenges-and-prospects>.

ruled Sudan for 30 years, quickly fell after encountering continuous protests and defiance by the military. To analyz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governance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ud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t the state level, Bashir's power rule and improper handling of many domestic affairs and relations full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strong government and weak governance. At the social level, Bashir's long-term repressive rule and the gradual growth in social participation after 2011 have expla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weak society and strong participation. The political change in 2019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Sudan. During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period, th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needs to work hard to improve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possible negative effects of social forces, so as to build a more harmonious and unified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achieve long-term stability in Sudan.

Keyword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State Governance; Social Participation; Sudanese Coup

Analysis on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fter Libyan War

Wang Jinyan

Abstract: In February 2011, the civil war broke out in Libya, then evolved into a color revolution due to military intervention by many western countries. During the decade since the war, the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and it has gradually mired in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economic hardship and social unrest, which has long been a security cancer in its own and adjacent areas. In this case, the post-war regime sought the support of external forces to maintain its rule. However, these interventions not only don't contribute to the reconciliation and stability in Libya, but also exacerbate the chaos. Under the medi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Libya has once again established a unified administration and restarted political transition process. After ten years of turmoil, people are eager to sta-

bility, the opposing factions are moving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and the country is going towards stability and unity. However, the decade of instability has devastated its national power, external intervention continues, the country's future is facing challenges in many ways.

Keywords: Libya; Libyan Wa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ontinuation and Change: The “February 20” Move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Morocco

Meng Jin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February 20” movement dragged Morocco into the whirlpool of the “Arab Spring”. Through constitutional reforms, Morocco respond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a timely manner, adjusted the political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redefined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Moroccan identity, and put Morocco on the fast track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However, the Moroccan political power center is still occupied by the royal family, the marginalized status of political parties has not changed, and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Moroccan economy and society will continue to exist for a long time. The “February 20” movement expanded Morocco's traditional political space and changed i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de. Moroccan people intensified the interactions with state power through social movements and cyberspace. This is a deeper change brought to Morocco by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Currently, how to grasp the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al religion and modern democracy,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re still challenges presented to the Morocco's democratization.

Keywords: Morocco; “Arab Spring”; Constitutional Reform;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Berber Culture